

· 对话 ·

从古典文明到现代世界

尚 行

对话嘉宾：

李新伟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、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长；

张志强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；

李若晖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（吴玉章特聘教授）。

2026年6月9—10日，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召开，主题为“古今对话：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”。随着古典学研究从文本考释走向文明互鉴的现实关切，一系列重要问题越发引人关注。从古典文明到现代世界，人类能否从轴心期的精神分化中辨认出某种原初共相？中国古典学如何突破西方古典学的框架，确立自身的标志性概念？文明冲突依然困扰现代世界，古典智慧能否为承认差异、尊重他者的和平共处之道提供思想资源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本刊特别创办新的专栏“对话”，由栏目主持人尚行（本刊编辑部集体署名，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训）特邀李新伟、张志强、李若晖三位嘉宾，围绕古典文明的分化逻辑与底层共性、古典学的主体性建构与学科建设、古典智慧的现代转化与现实关怀进行了思想对话。

一、古典文明的分化逻辑与底层共性

尚 行：早期文明交流中的物质传播案例，对反思“文明冲突论”与重构文明互鉴机制有何理论价值？

李新伟：文明交流互鉴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正体现在对其他文明优秀因素的吸收上。距今4300年前后，金属冶炼技术、小麦、羊和牛等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传入，成为龙山时代社会发展和早期王朝建立的催化剂。在黄土高原地区，羊和牛在生业经济中的比重上升，人口增长，社会复杂化程度提高，促成了陕北石峁文化和晋南陶寺文化惊人的社会发展，使之成为能与东部地区竞争进而逐鹿中原的力量。二里头文化在学习并提升金属冶炼技术的基础上，开启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传统，这一传统在商周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，成为王朝制度建设的核心载体。商王朝凭借青铜兵器与新引入的马匹和战车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“莫敢不来享，莫敢不来王”的影响力。

尚 行：古典文明在轴心期的“突破”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分化过程，这种早期的文化差异生成机制，如何在长时段中塑造了当今世界的文明版图？

张志强：关于轴心时代的提法，虽然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化叙事，采取了一种多元文明视角叙述各自文明的哲学突破，但这一提法认为不同文明都具有共同的哲学突破，已经是一种预设的前提。实际上，在中华文明中，老子代表的形而上学突破和孔子代表的价值观突破，都建立在三代以来的文明成就之上，特别是建立在由三代历史奠定的经典传统之上。三代的经典传统奠定了哲学突破的方向和气质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夸大所谓轴心突破的意义，而必须从所谓温故知新、述而不作的意义理解孔子的创制意义，必须从所谓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的意义理解老子创制的连续性和无限性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人类文明的所谓精神分化，不是从轴心突破开始，而是从文明起源之际就已经奠定了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。文明发展道路是文明作为文化生命体从萌生到形成的生命发展历程。不同文明作为不同文化生命体的发展历程当然不同，但这种不同不是抹杀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性。不同文明作为文化生命体的不同发展历程，恰恰说明了传播和交流的必要性，也恰恰证明了人类不同文明作为文化生命体的共同性。人类文明版图起源于文明的开端处，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经过不断重构而形成新的版图，但文明的多样性从未因为某种所谓“普世”的力量而彻底消失。只有那些能够不断迎接挑战、保持生机活力、具有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性的文明，才能够实现自古及今的文明发展，实现文化生命体的新陈代谢，带来古老文明的有机更化。

尚 行：我们惯于强调古典文明的独特性，但在差异产生之前，是否存在某种人类文明早期的原初共相？

李若晖：正如恩格斯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》指出的：“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，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：人们首先必须吃、喝、住、穿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、科学、艺术、宗教等等；所以，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，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，便构成基础，人们的国家设施、法的观点、艺术以至宗教观念，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因而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。”任何一个得以长期存续的古代文明，都必须遵循这一基本规律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生产秩序的敬畏。生产秩序既是人类文明的基础，又不为人类文明所完全支配。这是因为只有遵循自然规律，秩序才能真正服务于生产。人类文明早期的原初共相即生产秩序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直接呈现，谦卑与敬畏由此成为美德。

二、古典学的主体性建构与学科建设

尚 行：在学科建设方面，古典学的核心标志性概念与学科边界应如何界定？

李新伟：回顾历史，西方古典学的主旨是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与阐发，为西方文明注入新的活力。西方古典学对古希腊罗马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艺术、科学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，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先驱提供了丰富资源，为现代西方文明奠定了思想根基。中国古典学肩负着传承和发扬中国古典传统的使命，探究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典传统的形成，向上追溯中华文明形成的源流，向下厘清其自秦汉唐宋直至当代演进的脉络。它旨在坚持全球视野、破除西方中心主义、突出中国立场、彰显中国价值、弘扬中国精神，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奠定古典传统根基。

张志强：古典学的核心是经典，特别是那些能够奠定文明基础和路向的经典。古典学重在从经典出发研究具有经典传统的文明，实际上古老的文明往往是具有经典传统的文明，古典学与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概念的区别就在于此，或许这也是古典学与一般文明研究的区别所在。古典学研究将哲学、人类学、历史学、考古学、文献学研究整合到经典研究中，探究经典如何从文明发展中结晶而成，又如何奠定文明的发展路向和精神方向，从经典中发现人类在应对共同处境时展现的古老智慧，从古老智慧中寻求人类共同的精神和价值基础。古典学研究可以帮助处于现时代的人类涵养一种看待文明差

异的智慧和心性，树立一种理性看待差异的真正的平等观，从而为破解现代性难题提供借鉴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古典学必须是世界古典学。古典学是一个学术平台，在这个平台之上，不同研究者从自身所处文明的经典传统出发，平等研究其他文明的经典传统，让不同文明传统在研究中实现有机的交流与互鉴。古典学研究本身就应该建立文明平等观的途径。对中国古典学而言，必须内在具有一种比较的视野，坚守只知其一便是无知的古老教训。只有自觉建立“以他为自”的认识伦理，才能真正获得“依自不依他”的彻底的文化主体性。

李若晖：古典学的核心标志性概念应当包含三个层次：以经典文献为根基，以思想学术为主脉，以政教体系为骨架。譬如，古希腊之荷马史诗、中国之五经，都属各自民族的经典文献，也奠定了各自民族思考人生与世界的基本方式，或者说民族性。古希腊之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学者，中国之孔子、老子等诸子，则成为各自民族思想学术的奠基者，他们基于民族性思考人类与超越性的相关问题，以及各自民族对人类的责任。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学确立了政治的目的是德性，孟子的君臣类型学则确立了“道高于政”的儒学理想。由此，古典学以其经典文献区分于理论性学科如哲学，以其思想学术区分于实践性学科如政治学，以其政教体系区分于超越性学科如宗教教学。

三、古典智慧的现代转化与现实关怀

尚 行：在文明冲突加剧的今天，古典智慧如何帮助现代世界确立一种承认差异、尊重他者的和平共处之道？

李新伟：中国古典学也是中国学者面向世界古典时代展开研究的古典学，它倡导“世界古典学”概念，旨在实现对西方传统古典学的超越。“世界古典学”的核心内容为：从世界文明史的全球视野出发，将古典学研究对象从西方传统的古希腊罗马之学，扩展至包含中国古典文明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；尊重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切孕育过杰出思想、产生过伟大心灵、拥有传世经典的古代文明；承认各古老文明都有自己的古典传统，也都可以在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中从古典时代汲取智慧。在文明冲突加剧的今天，开展“世界古典学”研究是落实“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”文明观的基础。

李若晖：古典学蕴含“经典文献”“思想学术”“政教体系”三分的格局，

使政教体系必须建基于思想学术，思想学术必须根植于经典文献，于是沟通思想学术与经典文献的释经学，便为一切古典学得以互相理解提供了可能性，进而为一切文明得以互相理解提供了可能性。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多次以释经实践融合不同宗教，如唐玄宗以“妙本”为核心，贯通儒家《孝经》、道家《道德经》与佛教《金刚经》，构建三教融合的思想学术体系，并建立了兼容并包的政教体系。华夏大地得以避免大规模宗教冲突，中华文明得以博采众长、熔铸伟辞，正是肇基于释经学的贯通。

尚 行：在您的理想中，古典学发展到成熟阶段，应该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留下什么样的印记？

李新伟：中国古典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，就是沁入中国人“一箪食，一瓢饮”的日常，浸润“修身”“齐家”“治国”“平天下”的每个阶段。古典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，应该是古典精神教育深入人心，让每个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体会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，确立真正的文化自信。

张志强：古典学的发展应从经典研究走向经典教育。古典学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学问，而是应对现代性的学问。古典学的研究理应带来经典教育的普及，在学习中华文明经典的同时，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，学习不同文明的经典，养成一种面对不同文明的平等的心性和贞定的智慧，面对喧嚣的时代变化和躁动的科技文明，始终守护人类文明的底线，用人类的文明关怀人类，坚守人类文明的方向。

（责任编辑：张梦晗）